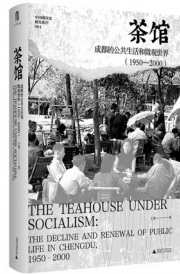




杨义堂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本书为著名学者王笛新作，通过考察20世纪下半叶成都的茶馆，探究大众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兴衰起伏，从而透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剧变。



《角落的人》

人气水彩画者熬路的“角落”系列最新力作《角落的人》，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时光机，带你重走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那些温暖角落。

张子敬在家向妻子蔡志真讲一些革命道理，蔡志真对妇女解放的道理很感兴趣，她也想入党，张子敬不知道怎么办，就去县城找老师高文甫征求意见，思想开阔的高文甫告诉他说：“这有什么问题？只要你妻子合格，就发展她入党，以后你们工作的时候，互相也有个照应。”

张子敬明白了，他的妻子蔡志真就成了单县第一名女党员，张子敬不仅发展妻子蔡志真入了党，还把自己的父亲张学田、四叔张学古、二嫂齐居真、四叔家的二嫂杨传荣等人都发展为党员，一家人齐心协力为党工作。张子敬在家排行老三，妻子蔡志真被称为“官三嫂”“红三嫂”，四叔家的二嫂杨传荣则当了张寨村的村长。每当有同志们来张子敬家，父亲在村外放哨，他的妻子蔡志真和二嫂齐居真做饭，安排好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张子敬全家既是亲人，又是革命同志，他把家变成了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与联络站。

1936年底，张子敬发展了张花园小学的同事、小学教员王培勋入党，王培勋回到家乡，在单县城及其周围的琴山区开始发展党员。张子敬把自己的内弟蔡志兰也发展入党，蔡志兰又在他住的刘庄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党员人数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37年前，单县先后建立了6个党支部（小组），共产党的火苗在单县大地上不断燃烧。

1936年底，高文甫因为“赤色嫌疑”，又被国民党县政府解聘了，他离开单县，去了北平。

1937年10月，金乡人翟子超奉上级党组织命令来单县组建中共单县特别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当时国民党正组织学校南迁，翟子超联系单县中学的魏钦公等党员学生，阻止单县中学南迁，呼吁青年学生留下来坚持抗日。不久，翟子超又回金乡工作，共产党员李毅以南下流亡学生的身份来到单县，和张子敬接上了头，在张子敬家的堂屋里成立了中共单县县委，李毅任书记。李毅戴着一副黑框的大眼镜，人们见张子敬对他很尊敬，都认为他也是张子敬的老师，就称呼他为“眼镜李老师”。

单县也要成立动委会，李毅出面做单县县长乔朗亭和国民党单县整理委员会书记朱育才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担任了单县动委会秘书，李毅又通过朱育才劝说单县保安大队长时锡九支持共产党，让共产党员王存典到单县保安大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后来，时锡九部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鲁西南工委书记白子明也悄悄地来到了单县张寨，四叔张学古把自己家最好的房子让给白子明住，张子敬全家好吃好喝地招待，白子明非常满意，加上在金乡的起义受挫，他将中共鲁西南工委从金乡耿楼村迁驻到单县张寨。

有一个叫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的小队伍来到了单县，他们只有20多人，司令没来，代司令叫王须仁，长条脸，有些驼背，戴着一副金边的眼镜，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嘴角有两撇红色的胡子。还有一个魏定远，胖乎乎的，显得心无城府，在他们游击司令部担任秘书。这些人的情况很复杂，王须仁在北平上学期间，参与过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and 共产党，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在被捕后变节，发表了脱党的宣言，后来跑到山西临汾八路军驻地。王须仁隐瞒了自己脱党的事情，以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办的学兵大队，毕业后在阎锡山的政治部干了一个月，和著名的“托派”人物张慕陶有过交往。徐州第五战区形势告急后，他们来到徐州，在李明扬那里争取了一个“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番号，徐州形势严峻了，他们跑到了单县。单县遭到日军轰炸时，人们纷纷逃出城里，正好位于四省交界的张寨要举办抗日武装，他们也一起来到张寨。因为他们是从山西八路军那里过来的，单县县委和鲁西南工委与他们接上关系，王须仁标榜自己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经过李毅推荐，王须仁担任单县县委员。魏定远因为在河南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国民党，他这个人很老实，如实交代了自己曾经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就没能入党。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六十九)

子贡手植楷碑

许晓帆

子贡手植楷碑，立于清朝初年，是后人为纪念子贡种植楷树以缅怀其师的事迹所立。此碑立于孔林享殿后、子贡手植楷前。碑高1.8米、宽0.74米、厚0.25米。文字竖排居中，上书“子贡手植楷”五字，无署款。原碑曾遭破坏，现已修复，今尚可见断痕。细看碑文，可以看到“植”字少了一横。原因为何，并没有妥帖的解释，仅有传言说子贡出门在外，未能在老师孔子辞世前及时赶回，后人少写一横以表其中的遗憾。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人。子贡以能言善辩著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其“利口巧辞”，其口舌之才常在孔子遭遇困境时发挥重要作用。他是孔门四科之一“言语”科的代表人物，位列“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还擅长经商，据说家中曾积累“千金”。子贡拜师孔子，虚心求教，为后世留下“瑚琏之器”“万仞宫墙”等著名典故。子贡与孔子情义深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众弟子在孔子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不舍离去，又守三年才离开，“情更深于诸贤，谊独重于千秋”，成就“子贡结庐”的佳话。如今孔子墓旁尚有“子贡庐墓处”以表彰其爱师之心。子贡手植楷，是子贡在为孔子守孝期间，亲自种植的一株楷树。孔子逝世时，孔门弟子及各地前来吊唁者，大多带来一株树秧种植在孔子墓旁，子贡手植楷即为其中之一。这种在坟旁植树的习俗，大抵是希望葱郁的树木代替自己长伴于逝者左右。子贡所种下的楷树，为黄连木，这种树生命力顽强，生长慢但寿命长。今孔林中多见楷树，据说都是子贡所种楷树的后代。子贡植楷的举动不仅是表达对老师的

哀思，更是以植树的方式寄托对孔子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时至今日，当年孔门弟子为悼念其师所种植的各株树木，大多已在岁月的洗礼中化为尘土，唯有子贡所种楷树尚存，但也多遭毁坏。清朝初年，其树遭遇一次雷火，几乎枯死，后又返青；清光绪年间又遭遇雷击起火，枝干多被毁。如今，此树只剩一段枯木桩。子贡所种植的楷树，能在千年风雨雷火中残存下来，后人常常称奇，认为是子贡多守三年孝，情深义重感动上苍所致。游人若在孔林之中找寻到子贡手植楷，可以看到其上已经建起小亭以保护这最后残存的树桩，这个小亭相传与“子贡手植楷碑”同时建设。楷树残桩旁，除本文所提子贡手植楷碑外，还有两处古迹与之相关。一处是清朝初年立的施闰章赞手植楷诗碑，清代诗人施闰章游经孔林，感念子贡亲植楷树缅怀恩师的举动，留下赞诗以表敬意，诗文刻于碑上，留存至今：

不辨何年植，残碑留至今。

共看独树影，犹见古人心。
阅历风霜尽，苍茫天地阴。
经过筑室处，千载一沾襟。
另一处是位于楷树残桩北面的楷亭，亭呈方形，四角攒尖，四面通透，不设栅栏，亭内立有楷图碑，楷亭即为保护此碑所建。楷图碑大致于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刻，清康熙年间“子贡手植楷”遭遇雷击仅剩部分枝干后，时人担心此树再经雷火从而荡然无存，便描摹残桩形态并刻于碑上，以求保存其状貌供后人留念。

子贡手植楷的事迹，常为后人传诵与效仿。北京《益世报》1929年2月登载《奉安植树纪念——有感于孔陵子贡手植楷》一文，“凡送葬人员，欲表示敬者，可特集各地树秧，汇送南京陵地栽种，以作纪念等。我中国昔时孔子之丧，门弟子会丧，及四方来观者，皆移植其乡土树木，以资景仰，至今子贡所手植楷木，历二千余年，而枝干犹存”。文章提到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有人主张各地吊唁者可携带各地树秧种植于中山先生陵园，效仿孔门弟子汇种树木的举动，栽成纪念林。这一举动更证明，子贡手植楷的故事历经千年传诵，已从单纯的纪念升华为文化的象征，激励后人以实际行动继承先贤精神。

子贡手植楷碑的碑面仅是只言片语，但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人们在先贤坟前种下树木，希望树木能向下深深扎根，向上茁壮成长，并能长久地留存于世，恰如人们期盼着将尊师重教的传统、对先贤精神的珍视传承下去，让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永续光芒。